

杨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斯大林和卢卡奇引人瞩目。斯大林曾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然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其哲学思想曾被定为一尊，并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框架；卢卡奇曾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叛逆者和“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其哲学思想曾被指责为“企图取消唯物主义来阉割辩证唯物主义”，后又被称作“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并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本文拟就斯大林和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观点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斯大林非常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

即使撇开自然观能否作为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不说，斯大林的观点也包含着致命的理论错误，即斯大林所理解的自然存在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便构成了斯大林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尽管斯大林没有提到“本体”或“本体化”一词，但他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自然本体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斯大林没有看到，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自然存在转化为社会存在。这是一个“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形成的过程。换言之，通过实践，自然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在“周围的感性世界”中，自然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存在于社会历史过程中。然而，斯大林却把自然环境从现实社会、现实的人为活动中剥离出去了，成为一种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的活动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或“抽象的物质”，并以此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斯大林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只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这种理论上的特殊性，才使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有别于机械唯物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8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考察表明，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当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同时就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导致历史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超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观念中立刻显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恰恰以这样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变形”：马克思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人类学的自然界”不见了，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质和现实世界基础的实践被遮蔽了，人的主体性被消解了。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自然是脱离了人的活动以及历史过程的自然，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这是向以“抽象物质”为本体的近代唯物主义的复归，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斯大林企图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简单地、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及其本体论，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从总体上看，由斯大林奠定基础 and 制定框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唯物主义”，或者说，是“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侈谈“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踏

上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二

如果说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理解曾被定为一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几十年，那么，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及其本体论的理解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风风雨雨几十年。从总体上看，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论述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后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虽然注意的中心都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二者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却有较大的差别。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并强调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总体对局部具有普遍优越性，任何局部只有和总体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把社会生活孤立的事实看作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方面结合到总体性中，关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客观上，行为是指向一种总体性的转变”。（卢卡奇，1989年，第10、198页）这样，卢卡奇便认为“在历史本身中找到了辩证法”。

由此，卢卡奇认为，一切都要立足于历史，都需要用历史去说明，即使实践的主体也是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的。就这样，卢卡奇便认为找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历史，并确认“马克思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历史的批判”（同上，第53页）。

卢卡奇的这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历史的自然”的思想，由此划破了费尔巴哈“自然崇拜”的帷幕，把历史的阳光照到了自然界。当卢卡奇确认自然是社会范畴时，与马克思不谋而合，这对把马克思哲学一般唯物主义化、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自然化是一支“解毒剂”；他确认历史与实践的内在联系以及历史总体性，对于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唯物主义即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观点很有意义。但是，卢卡奇毕竟“矫枉过正”了。他肯定了“历史的自然”，可又忽视了“自然的历史”，不理解马克思的“自然的历史”的思想切断了黑格尔从绝对观念通向历史的道路；他肯定了历史的总体性，然而又夸大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甚至认为不是经济必然性而是历史总体性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差异；他肯定了历史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并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可又取消了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的舞台被限定在人与人关系的范围之内，并被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历史和阶级意识》笼罩着一层唯心主义的阴影。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犯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对实践的片面理解，忽视了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这一根本内容。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以下观点的真理性、预见性，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排除出去往往导致唯心主义历史观。

对此，卢卡奇后期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卢卡奇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并认为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劳动这个作为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被我忽略了”，而把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最重要的支柱消失了”。（同上，“新版序言”第21页）这就使《历史和阶级意识》“无意识地带上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屈从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已发生过的这种倾向，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的哲学，从而忽视和否定了它关于自然的理论”，并和这种倾向一样，“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同上，第53页）卢卡奇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见解也是相当深刻的。正因为如此，卢卡奇写下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一重要著作，其愿望就是为马克思的“历史是唯一的科学”这一思想奠定基础，“写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卢卡奇自传》，第48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就是“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注意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弗兰茨基，第101页），确认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并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规定为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实践，尤其是作为“第一实践”的劳动始终起着基础、核心的地位。“整个社会存在，就其基本的本体论特征而言，是建筑在人类实践的的目的性设定的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即把劳动理解为有目的、创造性的存在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的理论，第一次奠定了社会存在的特性”。（卢卡奇，第309、2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又称为实践本体论。

按照卢卡奇的观点，“人的劳动总是有目的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卢卡奇自传》，第294页）这就是说，劳动包含着人的目的性，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前提。这是一种能动的、改造自然的的活动，它在客观的因果链条中插入了人的目的这一环节，不仅使自然发生形式变化，而且还在自然中实现人的目的和社会的需要，从而使自然不断被“社会化”；同时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限制不会消失”，“这里谈的是自然限制的退却，而不是自然的消失”，而且人类不可能“完全扬弃这些限制”。这样，卢卡奇就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纳入了实践范畴，从而克服了《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缺陷，使实践概念有了实在内容。

卢卡奇的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这个观点马克思重复了不止一次，而且被写进了《资本论》的定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现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由于正确理解了实践及其作用，卢卡奇便极为强调“实践”、“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明确地把实践本体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实践范畴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社会存在本体论。

如果说“历史”是《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核心范畴，那么，“实践”或“劳动”则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对实践的深入探讨，使卢卡奇意识到人的存在都是社会存在，而历史性则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根本特征，同时，进入到社会存在中的自然及其客观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延伸在社会存在之中。卢卡奇由此认为，“实践本身最直接地提供了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最重要的证明，实践对于真正的、批判的本体论来说，也是必要的客观核心”。（卢卡奇，第13页）至此，卢卡奇就超越了斯大林，超越了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回到了马克思，恢复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本来面貌，并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可是，就在卢卡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他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一般本体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本体论以一般本体论为前提”，“社会存在本体论只能建立在自然本体论的基础上”。

“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才获得了它的内在的必然性和可靠性的科学根据”。（卢卡奇，第326、472、151页）这样，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卢卡奇与斯大林又不谋而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卢卡奇最终把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把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化。这样一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然本体论竟然反过来成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卢卡奇超越了斯大林，可最终又回归斯大林。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一个对卢卡奇来说似乎不该发生的理论悲剧。可是，它又的确发生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卢卡奇的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一种依据“时间在先性”的考察方法，即还原论的方法。以此为方法依据，卢卡奇把无机自然、有机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三大存在方式“在世界的不可逆过程中的先后次序理解为从本体论上进行自我思考的核心”。（同上，第10页）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卢卡奇为什么最终把自然本体论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了。这里，卢卡奇忽视了马克思的下述深刻思想，即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自然或物质对人来说，是“无”，是“不存在的存在”；以这样的“抽象物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唯物主义”，而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潜蕴着“唯心主义的方向”。在自然对人的“时间在先性”和人对自然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逻辑在先性”的矛盾面前，卢卡奇似乎力不从心了。

三

以上，我评述了斯大林和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同时，在评述的过程中又随时随地探讨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概括前述，作出如下结论。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没有论述过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哲学只是世界观而不是本体论。这是一种误解、一种偏见，而且是无端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论述过本体论问题，论述了“本体论的证明”和“本体论的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论述了“本体论的肯定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集中论述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本体论问题，因为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本质和意义的。卢卡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本体论著作，但马克思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关于存在的论述，即都是纯粹的本体论”（同上，第559页）。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造成的革命变革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其结果就是终结了传统的本体论，建构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本体，也构成了人的生存的本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指向的就是“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并确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从而真正解决人与世界、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这样，马克思便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尘世”，把本体论与人间的苦难和幸福、与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从而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找到了哲学和改变世界的直接结合点。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即生存论的本体论。这是对人的终极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双重关怀，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马克思的深刻见解在很长时间内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上，斯大林已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以一种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的活动无关的“物质”为基石的。这就把马克思哲学一般唯物主义化，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彻底自然本体论化了，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解读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抛弃了，这是马克思哲学史上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卢卡奇的目光可谓敏锐，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预示着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走在“复活”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道路上，为我们全面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然而，由于方法论的不当，卢卡奇最终又走向一般唯物主义及其本体论。卢卡奇超越了斯大林，可最后又回归到斯大林，回归到近代唯物主义。卢卡奇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共同证明一个道理，即必须站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及其当代意义。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一理论以至整个哲学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创建的，它在当时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关注。正因为如此，后人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时，忽视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生存论的本体论，丢掉的恰恰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意义的方法，因而造成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内在缺

陷，即在脱离了历史过程的“抽象物质”中寻找一切精神现象的依据。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和科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使马克思的生存论的本体论，以及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方法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弗兰尼茨基，1988年：《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英文版。

1989年：《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

《卢卡奇自传》，198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斯大林选集》，1979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黄慧珍（《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